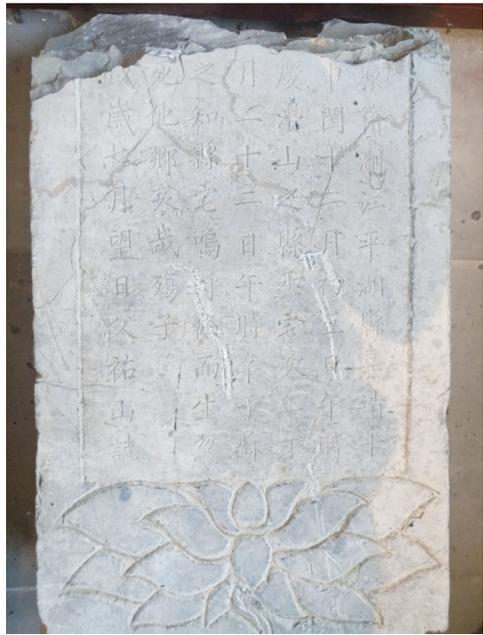


常熟言子祠新入藏明代残碑考

孔令通



冯敏勤墓碑

常熟山清水秀、人文荟萃，名胜古迹众多，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49年后，经考古发掘和社会征集，发现了诸多重要墓志，分别收藏于常熟博物馆、常熟市石刻博物馆等处。

近年来，常熟市文化部门又陆续新发现石刻多种，藏于言子祠西廂。其中一方墓碑裂为两半，上半段已经亡失，仅存下半段，碑底刻有莲花纹饰。残碑长65厘米，宽38.5厘米，厚13厘米。志文7行，每行残存10字不等。正书，周边为单线框，石质。兹录文如下，并略做考证。

……原籍浙江平湖县，嘉靖十……中闰十二月初五日午时……庆潜山之县丞宅。次年丁……月二十三日午时卒于苏……之知县宅。呜呼，倏而生，忽……死他乡。哀哉殇子……成岁七月望日，父祐山志。

通览碑文，这方残碑当系明代嘉靖年间一位父亲为殇子所立墓碑。墓碑虽然已经残缺，但幸存部分，还是提供了关于这对父子的关键信息数条：

第一，殇子系“嘉靖十……中闰十二月初五日午时……庆潜山之县丞宅。次年丁……月二十三日午时卒于苏……之知县宅”，可知其生于明嘉靖十年到十九年之间，生年为嘉靖口申年，次年嘉靖丁卯年卒。按：嘉靖十年为辛卯年，嘉靖十九年为庚子年，这十年间，符合这一标准的只有嘉靖丙申年、丁酉相连的两年。故可知这位殇子生于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年），卒于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年）。

第二，殇子原籍浙江平湖县，生时（嘉靖十五年）其父任直隶省安庆府潜山县县丞，次年丁酉（嘉靖十六年）去世时其父任直隶省苏州府常熟县知县。且父自署“祐山”。故可知其父为浙江平湖人冯汝弼（字惟良，号祐山）。冯汝弼《重修常熟县志序》云：“嘉靖丁酉，汝弼自潜山丞移宰常熟。”《祐山杂说》“达人知命”条亦云：“嘉靖戊戌，余转令苏之常熟三年”，“宋御史”条云“嘉靖丙申，余滴官潜山丞”。与墓碑所叙，若合符节。

第三，此墓碑撰于“口戌岁七月望日”，殇子既卒于嘉靖十六年（丁酉），那么这方墓碑当作于冯汝弼任常熟知县期间，故“口戌岁”即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年）七月望日。冯汝弼在其妻子孀孀人故去后，撰有《亡妻孀孀人行实》（《祐山先生文集》卷6），提到孀孀生有三子：长子敏功，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年）生，嘉靖三十三年（甲寅，1554年）五月二十日去世，冯汝弼撰有《仲儿敏功妇钱氏合葬墓志铭》（《祐山先生文集》卷6）。季子敏效，嘉靖十七年（1538年）生，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去世。可知殇子为敏功之弟，敏效之兄，当亦为孀孀所出。冯汝弼撰写妻子行实时，因此子早夭，故未叙及。

综上，这方墓碑系明嘉靖十七年七月望日，时任常熟知县冯汝弼为殇子所立，字里行间饱含着一位父亲的爱意与沉痛。这篇墓碑不载于《祐山先生文集》，系集外佚文，是目前发现的冯汝弼在常熟任上的唯一一方石刻，具有相当价值。

冯汝弼，字惟良，号祐山。以《书经》中嘉靖辛卯举人，壬辰会魁。由行人给事工科，劾罢权宦汪鋐，迁潜山丞，历常熟，余干知县，封文林郎，升太仓知州，终扬州府同知。以子敏功贵，累封中宪大夫、山东按察司副使，加赠中大夫、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所至祀名宦，平湖祀乡贤。生弘治己未，卒年七十有九。娶屠氏，太保康禧公侄女，封孀人，累赠淑人，继徐氏，封宜人，累赠淑人。孀淑人合葬王谷山阜庄中穴，徐淑人葬墓之外昭烈，周氏葬山后金丝浜。子四，俱元配出。（见《大易冯氏谱》，又可参家谱《皋八祐山公》）其生平详见王锡爵撰《祐山冯公行状》（《王文肃集》卷11，明万历刻本）。著作有《祐山先生文集》（明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明别集丛刊》影印本等）、《祐山杂说》（明《宝颜堂秘笈》本、《说郛》本、《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等）等，辑刻《三苏文辑》五卷等。其门下最有名者为太仓王世贞、《祐山先生文集》即由王世贞撰序。

冯汝弼在常熟任上，兴利除弊，造福一方百姓。据《重修常昭合志》卷20《人物志》载：“时方率旨丈田，当事互相观望，汝弼毅然移会邻治，照乡、都、里、甲，挨圩立号，令田主同圩长自为丈量，填注号段步亩，鳞次绘图造册，或日复核。每圩立一大旗，每段立一小旗，履亩抽复，按图册有外误差重，而再三申复之，必合乃已。田无漏籍，户无虚粮，期年而事竣，积弊一清。汝弼为政有风裁，而宾礼贤士，聘举人邓献修邑志。其文田著《清理田粮或问》以折当时之异议者，然同列皆忌之，竟为直指论，调去。”

冯汝弼所出之平湖冯氏，系嘉兴望族，世居平湖大易乡。近代著名学者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即对冯汝弼这一支有所论述。平湖冯氏元以上世系，家谱无存，遑无可考。自始祖冯显于洪武年间定居平湖起，诗书传家，代有闻人。冯汝弼之父冯俊于明弘治年间辑修家谱，分抄两份，传之子孙，后因兵乱等原因焚毁无存。冯汝弼于嘉靖年间续修此谱，但今已不存。其裔孙冯秉良继承先志，纂有《大易冯氏谱》，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刊刻，是关于平湖冯氏家族研究的重要文献。《大易冯氏谱》对世系梳理极为详细，冯汝弼四子，包括葬于常熟的殇子，家谱中均有详细记载。其云：“敏勤，生嘉靖丙申，随任常熟县，天，葬虞山麓慧日寺。”据此可知冯汝弼葬于常熟的殇子名冯敏勤。家谱中记载了冯敏勤生年及去世地点，与冯汝弼所撰墓碑一一吻合。故言子祠这方明代残碑主为冯敏勤，此碑可称为冯敏勤墓碑。特别是注明冯敏勤葬于虞山麓慧日寺。（《嘉靖》常熟县志卷10《寺观》：“慧日寺，在县城稍西。梁天监中僧惠向建。宋大中祥符元年敕为禅院，绍兴十五年毁于火，乾道淳熙嘉定始复旧观。元元统元年僧普明建观音殿于东偏，殿前有钟阁二级，愚宋邑令张观复所造铜钟，官设夫司钟以警旦暮。国朝宣德九年圯，邑人张士良重构。今为祝圣道场，归并寺二庵三。”据《乾隆》苏州府志卷25《寺观》载：“慧日禅寺，在县城北九十步。”可知冯汝弼选择将其子葬于此地，离县衙相距九十步，别有深意。慧日寺在清代旋兴旋毁，始终为邑中首刹。抗战期间，遭到日寇毁坏。1952年，慧日寺拆建为工人文化宫。《俞鸿筹日记》该年9月30日载：“吾邑慧日寺，创建于梁天监年间，屡毁屡复，因所处在市廛之中，寺地日窄，前之松松竹石悉无有矣。其中结构颇多明代遗物，顷闻已全部拆去，邑中古迹又少一处矣。”20世纪80年代，曾在慧日寺旧址征集到宋代经幢残件等石刻。这方冯敏勤残碑也是出土于这一区域。冯敏勤墓碑立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迄今近五百年，当是墓碑立后若干年即倒塌埋于地，故而近年出土时残缺了上半部分。因为埋于地下，少经风吹日晒，因此残碑碑面平整无划痕，字划十分清晰。



图3 说法图



图4 经文

嘉兴真如塔藏血摹本《金刚经》浅析

时西奇 赵丽丽



图1 盒盖正反面

图2 盖板正反面

真如塔位于嘉兴城南真如寺内，是嘉兴“七塔”中最高的一座古塔。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南法华师募缘兴建，烧造五色琉璃瓦，以为庄严”（清许璋光重辑：《嘉兴府志·卷十八》，光绪四年鸳鸯湖书院刊本）。后几经兴废，至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僧明句重建。塔为七层砖身木檐的楼阁式佛塔，平面呈六边形，塔第一层一面开券门，第二至第七层每面都有拱形券门，每层均叠涩出檐，上有木质栏杆，六檐角均挂铃铎。塔刹为生铁浇铸，由铁质的覆钵、仰莲、七重相轮、宝盖、宝珠、宝瓶组成。20世纪70年代，在拆塔过程中发现了一批塔藏文物，其中一件便是清代钱世选血摹的元代赵孟頫手书《金刚经》版刻印本。

经书置于一抽拉式朱漆木盒内，盒盖绘泥金七层真如塔图，内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盖反面墨书“浙江嘉兴府嘉兴县盐仓坊奉佛弟子钱世选刺血书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上祈父亲钱武/年六十八岁/本命壬辰/九月十三日吉时建生/母亲周氏/年六十一岁/本命己亥/十一月初八日吉时建生/仰赖佛慈悲庇佑/福寿康宁/子孙昌盛/吉祥如意/己亥岁小春下瀚五日穀旦”（图1）。盒内有一木质盖板置于经书之上。盖板正面中间阴刻楷体“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绿色颜料填充，反面墨书“癸巳岁九月屠成烈识”（图2）。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书，纸本，由说法图、经文、跋文组成。说法图横50.3厘米，图中释迦牟尼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周围有阿难、大迦叶、菩萨、天王等（图3）。经文横1200.0厘米，纵35厘米，为嘉兴人钱世选在元代赵孟頫手书《金刚经》刻本上刺血摹写而成（图4）。刻本二十纸，每一纸为一版，每版五个半叶，第一、二半叶或第二、三半叶之间刻有小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经版序号。每半叶五行，经文正文每行十三字，补缺真言每行十五字，其后又有金刚明真言、发愿文、赵孟頫题识和中峰明本题识（图5），每行十三字至十八字不等。第三纸第四半叶、第四纸第一半叶、第七纸第四半叶、第十五纸第二半叶盖有戳印。

经文第三纸、第七纸、第十五纸上戳印相同，共计三行，每行十六字：“潮音氏普觉喜合，葛兆魁、王氏经资，报荐/先外祖考仰溪周公，先外祖妣陈氏孀人/生人天中，受胜妙乐，在三恶道皆得远离。”第四纸戳印共计二行，每行十四字：“释子普觉，续佛慧命，发菩提心，上报/如来济度之恩，下拔一切三涂之苦。”普觉应为主持刻印此经的僧人，葛兆魁、王氏为施资者。葛兆魁见于清嘉庆《嘉兴府志》载，为葛天麟之父，赠儒林郎。经文后书“浙江嘉兴府嘉兴县盐仓坊奉佛弟子钱世选，血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上祈父亲武、母亲周氏/福寿康宁，吉祥如意，丁酉秋孟旦”。

跋横270.0厘米，位于经文后，为清代溧阳史燧、副塔里黄涛、秀水黄颀、携李陈于陞、会稽竹林禅院山野行溪、佛弟子俞月柯、儒士盛世章、嘉兴永丰佛弟子盛鸿仪、嘉兴俞显、嘉兴朱臣之、秀水蒋人、比丘通复、龙山许策、梅花里蒋道远等人对钱世选刺血摹经、祈父母延年一事的赞赞跋文（图6）。

关于经书中的年代，从跋文内容可以看出，真如塔在顺治乙酉年（1645年）毁于兵火，钱世选于顺治丁酉年（1657年）血书《金刚经》，之后常捧经诵读，并在顺治己亥年（1659年），将经书供奉于真如塔顶天宫之中。跋文的题写时间从顺治己亥年秋日上弦一直持续到了这一年的初冬，这也说明府志中记载的真如塔于己亥年重建，应为竣工之年。此外，在经书盖板背面另

有一年号，即为“癸巳岁（1653年）九月屠成烈识”，早于摹写及送塔时间，应为钱世选获得经书制作木盒加以存放的时间。因此，结合主持和出资刊刻经书的人物背景，可知嘉兴博物馆藏的这件钱世选血摹元赵孟頫手书《金刚经》的刊印时间上限明代末年，下限为清顺治十年（1653年）。

目前传世尚能见到的至大四本年赵孟頫《金刚经》有几个不同版本。一是（传）元杭州杨家经坊刻本，版刻，经折装，一张九折，刊刻于杭州。赵孟頫书经部分已佚失，仅余中峰跋语残段，开头部分残缺一行半。后有空白牌记，刻有小字“杭州众安桥北杨家经坊印行”，后接线刻书院像一页。二是明洪武徐道圆刻本，版刻。首尾完整，经折装。明洪武八年刻于杭州，日本东京宫内厅藏。此本卷后有小子款记，明确记录施主、年月等信息。三是明大名石刻本，为青石质，横式，共六块。各高31厘米，宽102厘米，厚11厘米，两面刻，凡11面，每面40行，尾面15行，满行13字，约5000余字，每字为15×13厘米，镌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部。第四便是真如塔藏的清钱世选血摹本，此版本有上下双边界栏，符合明代雕版印刷的版本风格。行间无线框，有版号，有行间小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多经，经文全篇有句读符号。与其余版本最为不同的是，在经文之后，赵孟頫题识之前还补入了真言、赞语和发愿文，共计十七行。

嘉禾之地，南倚钱塘，北负太湖，西接天目，东临大海，大运河贯穿其中，揽江河湖海之胜，物华天宝，地腴物丰，优越的生态环境温润造就了厚重的历史人文。赵孟頫的一生中，虽然主要活动在湖州和大都等地，但他与嘉兴的文化联系和亲友往来都是不可忽视的。他在任江浙儒学提举期间，多次造访嘉兴，为嘉兴留下多种碑刻书迹。赵孟頫好写佛经，传世写经较多，流传于世的多达八十余册，有《金刚经》《心经》《圆觉经》《无量寿经》等。《金刚经》为禅宗立宗经典，以“无住于相”为核心，深刻阐释了大乘佛教的空观思想。元至大四本年二月赵孟頫书钱亮去世，赵孟頫为其书写金刚经一卷并寄给老师中峰明本。《金刚经》不仅是赵孟頫用以精进佛学修行、净化身心的禅宗经典，更是其用以寄托对至亲哀思、排遣心中困苦的一剂良药。嘉兴真如塔发现的这一版本《金刚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佛教信仰及地域文化。作为佛教的重要经典，赵孟頫抄写的《金刚经》版本在民间尤为盛行，这也使得佛教寺院和信徒们纷纷出资刊印，以祈求保佑和功德。

关于经书中的年代，从跋文内容可以看出，真如塔在顺治乙酉年（1645年）毁于兵火，钱世选于顺治丁酉年（1657年）血书《金刚经》，之后常捧经诵读，并在顺治己亥年（1659年），将经书供奉于真如塔顶天宫之中。跋文的题写时间从顺治己亥年秋日上弦一直持续到了这一年的初冬，这也说明府志中记载的真如塔于己亥年重建，应为竣工之年。此外，在经书盖板背面另



图5 赵孟頫、中峰明本题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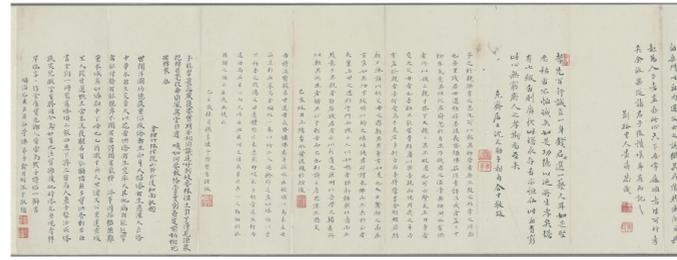


图6 跋文

跨越一个世纪的邂逅：《郑冢古器考》1925—2025年传奇之旅

牛爱红

先生，谢绝了外界的纷扰，在自己的书斋“梦周山房”中捧卷读“礼”。他将《周礼》《仪礼》和《礼记》中关于名物制度的记载与1923年郑公大墓出土的古器形制相印证，对先世大儒的学说进行琢磨校订。在此基础上，他编撰了《郑冢古器图考》十二卷。同仁们纷纷催促他印刷出版，以先睹为快，分享业界。但关先生坚持认为，考订古器物应文字与图像并重，方能使读者真正得其要领。于是，他每日往返于开封文庙的古物保存所，观察琢磨保存于此的郑公大墓出土文物。他仿照宋代人绘制博古图的方法，精选60余件精品，用中国画铁线描法精心绘制了线描图。历时半年有余，于1925年9月完成了书稿，了却了一桩心愿。

说起此事，要追溯到1923年（癸亥）8月，河南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青铜器和其他文物，这批文物的出土引起了学术界的沸腾。面对这一重大发现，时任河南通志局金石志纂修的关百益迅速投身到研究工作中去。在近百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中，他首先对唯一一件有铭文的“王子婴次卣”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据此成书《周王子婴器识考》。该书于同年10月由河南金石编篆处印刷出版。然而，关百益先生对其他古物的形制功用未能一一考证辑为专书，心中始终留有遗憾。

《郑冢古器图考》是对新郑出土古器的一次初步整理和研究。书中收录的青铜器造型精美、纹饰繁复，宛如一件件艺术品，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器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艺术的瑰宝。全书将出土古器分类编排，详细描述和考订了每件文物的尺寸、重量、造型、纹饰、用途等信息。凡相同之器，皆摹描一图，共录入器物127件（其中铜器113件）。除了对文物进行分件考释，关百益还记录了许多郑公大墓发掘实况，如在墓中发现“人下颌骨”，“骨面满敷辰砂”，十分特别；又如“重器以百余计，而古玉如星寥”，仅存玉片等件，复言“传闻当启墓时，得玉盈匣，后不知归于何有”，话语寥寥，但乱世宝器难存之状，已现于纸上。

他还将考古发掘与现代科学互参，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如他通过研究墓中人下颌骨上已生智齿，而牙上珐琅质未曾损坏，推测墓主年逾三十而未及衰老；又结合在《周王子婴器识考》中所言，推测墓主为郑厉公。书中结论不一定准确，但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为后来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该书在当时对考古学、历史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相关学科发展。

1930年2月，中华书局将《郑冢古器图考》一书印刷发行，这不仅推动了当时考古学、历史学的发展，也极大地提升了河南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前身）在学术界的影响力。然而，由于时间久远，存量极少，这部著作的庐山真面目始终难以展现在世人面前。

关百益先生，是一位在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及书画等多个领域都拥有深厚造诣的杰出学者专家。1930年12月至1935年10月，他担任河南博物馆馆长一职，在考古发掘、学术研究、陈列展览、宣传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极大地推动了河南博物馆的发展。当时的报刊曾赞誉道：“豫省为历代都会所在地，时常发现古物，故除故宫博物院外，收藏之丰在国内首屈一指者为河南博物馆。”

（下转8版）



周立鸟盖方（现定名：莲鹤方壶）壶线描图

“这些文物的线描图精美绝伦。其线条匀细圆转，遒劲有力，仿佛带着一股古老的力量，在诉说着那段被尘封的历史。从这些线条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前辈们的智慧与才华，更能领略到老馆长那令人钦佩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当下的我们，正是要传承这样的学术精神啊！”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轻轻摩挲着硫酸纸上那栩栩如生的莲鹤方壶，不禁感慨万千。此时，钟表已悄然指向了2025年1月3日的刻度。

马萧林手中的书稿，正是那本历经近一个世纪风霜的《郑冢古器图考》。这是一部凝聚了无数智慧与汗水的学术巨著，是20世纪前期著名学者关百益先生（1882—1956）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故事还得从1925年说起。

1925年（乙丑）闰4月，为母守孝（丁忧）的关百益